

东亚价值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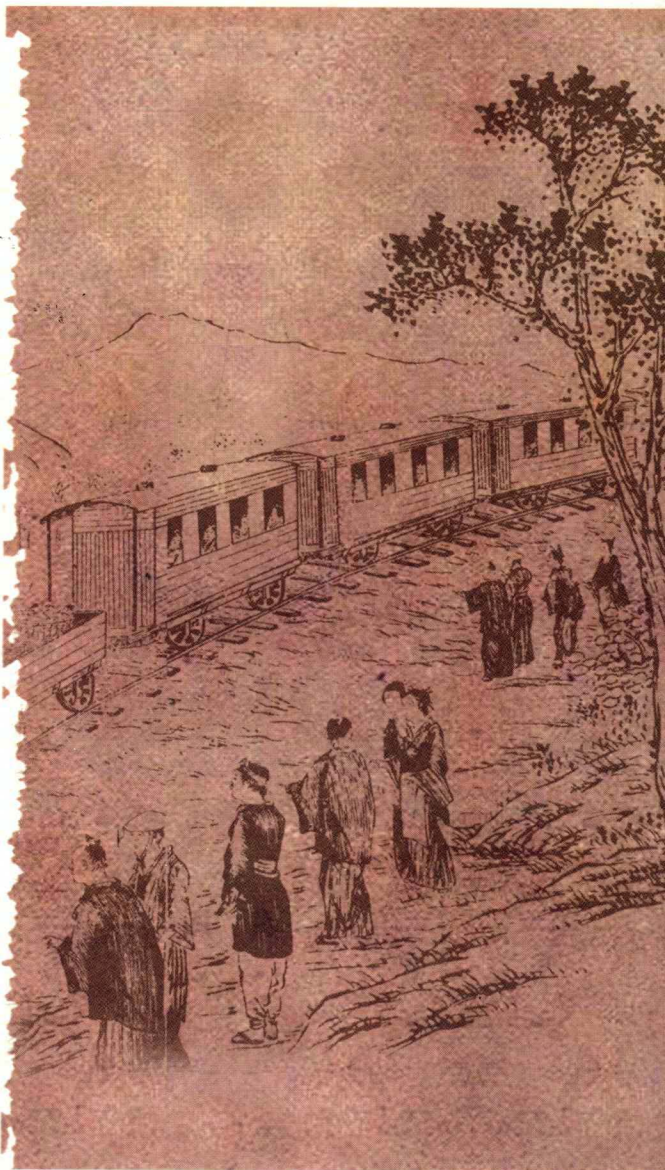
在西方价值随着西方的崛起而成为所谓“普世价值”的时代，在西方世界出现了把东亚文明诬蔑为停滞的文明之殖民话语，也出现了所谓的“韦伯命题”。

# 东亚的价值

D O N G Y A D E J I A Z H I

吴志攀

包茂红 李 玉  
副主编 主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东亚的价值

主 编 吴志攀 李 玉  
副主编 包茂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的价值/吴志攀,李玉主编;包茂红副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301 - 15992 - 7

I. 东… II. ①吴… ②李… ③包… III. 东亚 - 价值(哲学) - 研究  
IV. D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7837 号

**书 名: 东亚的价值**

著作责任者: 吴志攀 李 玉 主 编 包茂红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尚 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5992 - 7/G · 270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6.5 印张 381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 序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东亚国家的追求目标。尽管东亚各国自身的国情不同,发展路径各异,但是大目标却惊人相似。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发达与先进的西方已经成为东亚国家现代化最重要的参照系。从东亚近代史一路风雨兼程来看,东亚国家向西方学习,是既被动又主动,既茫然又明确,既屈辱又不屈。这个历史进程,还在继续。

而西方的现代化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一个大话题,其中包括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的创新,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建立与建设,乃至对外扩张取得市场与资源,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是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人自己发现了自己。在走出中世纪时,一盏盏明灯在欧洲自身燃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人到一个个群体。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大方向上一致,但各自的具体道路则很不相同。同时,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也绝非鲜花铺地,其代价之大,绝非今天就可以画句号的。

随着近现代西方在世界的扩张,另一个现象也出现了,即原本多姿多彩的世界被西方单一的话语体系归纳并描述。对此,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批评说,这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看世界”。欧洲自己燃起了明灯,又为照看别人竖起了路灯,这是一个大历史现象,它要变化。而变化之际,就是地球上别的地域,包括东亚在内,重新自我发现之时。

东亚的自我发现,走过的是与欧洲、美国不同的道路。它是先受到外部的压力,被“他人的路灯”照亮,继而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中,重新发现自身文明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明灯。

东亚有自己的精神资源吗?在西方力量到达东亚之前,人们用何种物质与精神的方式在自我完善、生存繁衍?精神资源,包括人对宇宙自然

的畅想与歌颂、对世事及人生的思考与参悟以及在应对各种难题时的定力与能力。所有这些沉积下来,就是一种文化命脉。文化是一种生存能力。它自成体系,渗透到群体与每个个体的血脉之中。一旦遇事,自然发力。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天崩地裂,但是我们在巨大悲痛中体悟到了人的精神传承。这种传承还将继续传至子孙后代。因为它本身就是远古精神的现代回响。诗人李白在一千多年前不是已经描绘了吗:“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从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东亚的精神传承是一个巨大的体系。它的本色就是开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而不同”,这是一种精神气质,闪烁着灵性与智慧之光。

目前,全球正在和另一场人祸拼搏,这就是2008年秋天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身处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中的东亚,需要沉着应对,也需要再一次调动潜能,在新的挑战面前展示自身的价值。

袁 明

2009年3月

## 编辑说明

价值指事物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与功能。价值观是人在认识各种事物基础上形成的对其价值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尽管东亚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无论是东亚人还是来自其他区域的人都能在这里感受到一种相似的、与欧美世界不同的价值观念。东亚价值尽管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进步和曲折,但是,它就像永不停息的时间一样一直延续下来。东亚价值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同时也是通向未来的。

在当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这个曾经形塑了东亚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但在近代一度被置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东亚价值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当世界面临许多从国内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中涌现出来的问题,但用西方价值无法解决时,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再次投向东亚的价值。新时代和新形势要求对东亚价值做出新的解释,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应运而生。例如,东亚是否存在一种统一的价值?东亚的价值是什么?东亚的价值如何被“他者”化?东亚的价值如何被重新发现?东亚价值上如何生长出自己的现代性?东亚价值对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建设和谐世界有何启示?等等。

汇集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发表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为推进东亚价值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助力,促进东亚古老价值的创生和复兴,使其在推进东亚文明的复兴以及世界的和谐与繁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编辑和出版本论文集的宗旨与目的。这些论文都是作者倾注精力、潜心研究的成果。阅读这些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定会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本论文集共收入 20 篇论文。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我们依据论

文的内容,将全书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的是东亚价值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这部分收入了孙歌、贺圣达、李文和阮秋芳4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把东亚价值的历史与未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认识论层面到具体路径、从单个国家到东亚整体,全方位地探讨了东亚价值对东亚在未来世界发挥作用的意义。

第二部分论述的是天下观与东亚世界秩序。这部分收入了李晨阳、张启雄、村田雄二郎和龙谷直人4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既有研究综述,又有哲学层面的分析,还有经济史研究,这无疑会拓展并加深对东亚固有的天下观和国际秩序的理解。

第三部分论述的是东亚价值与现代社会建设。这部分收入了陈来、白永瑞、陈弘毅、贾庆国、潘维、陈峰君和王庆东7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既从历史实践上总结了传统价值在东亚现代社会建设中的经验,又从理论上分析了传统价值促进东亚社会转型的潜力和可能性,还展望了传统价值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四部分探讨是否存在一个“亚洲价值观”。这部分收入了庄礼伟、山室信一2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阐明了在亚洲确实存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这种地域价值观不但仍然在东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将会对全球普遍价值的形成产生更大影响。

第五部分论述的是东亚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这部分收入了约阿希姆·拉德卡、宋荣培、何怀宏和包茂红4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将关注的重点从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把思考从现世扩展到未来,从而把传统与现代和未来有机联系在一起。

著名学者袁明教授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赐序,我们深表感谢。她在序中,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对东亚价值及其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学术讨论自由、尊重作者学术观点的考虑和文责自负的原则,编者对作者的学术观点不作任何改动。各篇论文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所见,不代表编者。

在本论文集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和机构的帮助。各位作者

不吝赐稿,提供论文,使论文集的出版得以实现。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志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歌研究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启雄研究员、《北京论坛》秘书长严军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元周副教授在组稿方面鼎力相助。韦民、王元周、李道晴等先生为论文集提供了清晰流畅的译文。责任编辑尚明认真负责。在此,我们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因编者的水平所限,书中还可能有不少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9年1月



# 目 录

## 第一部分 东亚价值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

- 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 孙 歌 / 3  
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的历史考察 贺圣达 / 33  
构建东亚认同的意义与途径 李 文 / 62  
东亚价值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阮秋芳 / 78

## 第二部分 天下观与东亚世界秩序

- 走向和谐宇宙:儒家关于太平世界的“和”的理想 李晨阳 / 89  
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国外交纷争中的  
古典文化价值 张启雄 / 105  
册封朝贡体制论再考察  
——从日本的视点来看 村田雄二郎 / 147  
自由贸易原则在东亚的渗透 龙谷直人 / 160

## 第三部分 东亚价值与现代社会建设

- 儒家思想与现代东亚世界 陈 来 / 181  
东亚的近代化与社会文化变动  
——传统社会的解体与市民社会的成长 白永瑞 / 189  
儒家与民主宪政  
——从 1958 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谈起  
陈弘毅 / 206

传统价值观与民主化进程:以中国为例 贾庆国 / 232

中国改革模式的文化逻辑 陈峰君 王庆东 / 242

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潘 维 / 257

#### 第四部分 关于“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的语义与渊源考证 庄礼伟 / 285

“多而合一”的秩序原理与亚洲价值论 山室信一 / 311

#### 第五部分 东亚环境观与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韦伯看儒家:韦伯中国历史观中的精神力和自然力  
约阿希姆·拉德卡 / 329

东亚有机整体论思想的哲学意义

——以庄子思想和中医理论为视角 宋荣培 / 343

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何怀宏 / 361

东北亚环境文化的交流与建设 包茂红 / 387

跋:亚洲价值的故事 吴志攀 / 409

## 第一部分

# 东亚价值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



# 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

孙 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一、中国社会既定的东亚视角及其问题性

关于东亚的讨论,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以至于一提到“东亚”,人们就会无意识地感受到某种既定的对象。可是,追究起来,这对象却有些含糊:它是指中国、日本、韩国,还是指中、日、韩加上北朝鲜,抑或再加上越南,或者再加上东南亚?我们到底把中、日、韩这个最常见的框架称为东北亚,还是语焉不详地称其为“东亚”?

比起这些地理性的问题来,更难于回答的是在今天中、日、韩三国知识分子交流的时候那个常常逼到面前的问题:中国社会为什么缺少亚洲意识?这是否与中国中心的大国意识有关?

中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分子常常觉得,与其进行所谓“东亚论述”,不如直接进行东西方对话;或者建立其他的视野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三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话,大概要比东亚对话更具有现实性。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与东亚、南亚、西亚和很少被作为单位提及的“北亚”地区都接壤的国家,中国很难完全地塞进东亚这个框架中去。“为什么一定要谈东亚?”

确实,如果我们追踪一下东亚论述在中国的兴起,可以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从我们的知识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毋宁说它有很大的移植色彩。这移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它使得日本还有韩国(或者说是“亚洲四小龙”)进入了中国社会舆论的视野,并借助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把冷战时期并不一体化的东亚视为

一个整体；而日本和韩国积累至今的东亚研究，以及日本与韩国的各种基金会推动的东亚研究项目，都对中国的东亚论述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来自于美国的地域研究框架，“亚太地区”的视野与美国大学里的东亚系框架，都使得东亚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可以说，为了回应国际上的种种新的趋势，中国的言论界也把东亚作为一个话题，并且越来越觉得它顺理成章地原来就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有关东亚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形成的东亚视角是相对薄弱的。这种薄弱并不意味着东亚话语不流行，也不意味着把东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研究成果积累不足，而是意味着，关于东亚的研究在中国知识界并没有获得认识论上的相应位置，它并没有把上述种种问题作为需要回应的问题，也几乎没有进行回应；同时，由于东亚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层面，这种经验性研究的本体论对象很少受到质疑，因此，在中国的思想与知识生产的层面上，东亚研究的定位是不清晰不自觉的。在这一基本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大致把当下构成了某种共识的关于东亚的视角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比较通行的东亚视角，是传统儒学的视角。这种视角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把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通过“儒学”的框架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且力求论证儒学中最基本的抽象价值观念（例如“仁”、“中庸”）在上述地区的普遍性。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很有限。即使在直观意义上，我们也很难断言儒教在东亚地区具有同一功能，因为我们无从解释为什么同样受到儒学影响，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更无从解释朝鲜半岛在被迫分为两个部分之后，它的“儒学”到底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起作用。假如我们把儒学视为已经过去的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将是不可回避的：儒学在东亚的不同国家里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即使在儒学的鼎盛时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也不能够毫无媒介地涵盖三个国家。在不同的国家里，儒学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它受那个社会本身的历史制约，不可能是抽象孤立的。在近代之后，儒学在东亚不同社会中的潜在功能更加不同，对此，已经有大量的个案研究可以证实。因此，假如儒学视角是观察东亚的出发点，那么，我们

不得不从儒学在各个社会的差异性而不是类似性出发,需要调动的不是直观经验而是对于历史结构的想象力。即使是试图以“传播学”的思路来确认儒学在这个区域内的走向,目标也很难设计为到底谁是“始祖”谁是“后继者”,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在于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对于儒学的“再塑造”功能,儒学从来不可能脱离政治环境以真空状态去“旅行”。如果以儒学为视角建立东亚论述同时又以直观的态度把东亚各国的儒学视为同一个东西,这样的东亚视角将会由于缺少历史和现实性格而变成一纸空论。

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说,儒学视角并不必然地等同于东亚视角,这是后来附会的历史叙述,并不能等同于历史逻辑本身。对于儒学而言,东亚的框架并不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东亚这个后来形成的历史叙述框架而言,儒学却是一个必要的黏合剂。因此,儒学作为“今天的视角”,其功能不在于认识“东亚的历史”,而在于力图论证当下存在着一个有着内在结合力的“东亚”。观察一下现有的“东亚儒学”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论述的功能在于通过“儒学”来消解东亚(而且基本上是中、日、韩)的内在差异,以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相关叙事结构。

第二种关于东亚的视角其实是受到日本影响的。这就是“现代化”视角。把东亚视为一个赶超和对抗西方以求实现现代化的区域,是日本在明治之后一直以曲折方式追求的思路。这个思路潜在地规定着日本知识分子思考东亚时的视角。在今天日本的东亚论述里面,也仍然再生产着这样的思路。在这个思路里,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与其说是对抗西方的盟友,毋宁说是赶超西方的竞争对手。<sup>①</sup> 谁代表东亚,一直是个潜在的

<sup>①</sup> 代表这个思路最高水准的力作当推山室信一的《作为思想课题的亚细亚——基轴·连锁·推动——》,岩波书店2001年版。此书利用大量资料集中讨论了日本乃至东北亚在近代转型期的“近代化焦虑”问题,把东北亚地区各国视为回应西方近代的挑战,相互争夺近代化主导权的竞争对手。该书指出,亚细亚主义是东北亚地区在遭遇了17世纪以来西方的世界认识之后发生的关于自身认知方式的变化,它带来了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文化习俗乃至政治实践的连锁反应。该书提供了很多精彩的分析和资料的线索,特别是充分考虑到了“国家利益”与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一部了解日本亚洲主义脉络的重要著作。但是,该书在结构意识上完全忽略了在亚洲主义问题上中国、日本、朝鲜之间的非均质特征,并且把近代转型期东北亚地区的近代化焦虑放大为亚洲主义的绝对前提,从而在客观上简化了这个思想课题在跨越国界时的历史复杂性。尽管如此,在理解日本近代以来关于亚洲主义见解的意义上,此书仍然具有高水准的代表性。

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成为某种社会公认的意识形态,日本的这种东亚论述也就随之获得了进入中国的可能。通过论述东亚,为现代化在东亚的形态找到某种表现方式,从而也就形成了潜在的共识:这将是东亚成为某个相对整合的系统的基础。但是,作为现代化视角的东亚论述暗含了一个方向性的误区:东亚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被加以纵向排列,而各国乃至地区所谓“现代化”的内容差异则被一笔勾掉,“西方模式”以一种同样整合的形式被抽象为某种既定的现代化样板,似乎现代化只有一种形态,那就是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来完成“福利社会”的建设。在这个视角之下,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东亚论述暗含着一个进化论的逻辑:处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东亚地区,最终将一同走向同一个现代化目标。因此,先发达的国家必然地把后发达国家的现状视为自己的“昨天”,相反,后发达国家则把先发达国家的今天看做自己的“明天”。

还有第三种视角,这就是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视角。东亚地区之所以可以构成一个整体论述的框架,有一个沉痛的因素是不可无视的,这就是战争记忆。在二战之前就开始伺机侵略中国大陆并在其后把战火燃向东南亚国家、强化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的殖民统治的日本,是东亚的一个残酷的“黏合剂”。到目前为止,在战争记忆的层面使得东亚社会获得相对深入共识的,主要是东北亚地区,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进步势力在追究战争责任和正确传承战争记忆方面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要素,它使得东亚受害国的战争记忆有可能转化为日本社会变动的外在压力,同时也使得受害国民众的创伤记忆有可能得到某种回应。近年来关于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参拜事件、慰安妇诉讼、细菌战诉讼、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被害者索赔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日本的战争处理问题不得不“国际化”了。这个过程带来了一个并非预设之中的收获,就是东亚的民间社会开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融合,使得东亚的相关人士跨越国界站在一起,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展。不过,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种进展伴随着相当深刻的内在紧张,而这种内在紧张暗示着调整认识论的客观需求。第一,在讨论战争创伤记忆的时候,个人的记忆只有被整合进国家



框架论述中去的时候才能获得历史记忆的形态,而在此种情况下,“国家利益”将构成绝对的前提。于是,在一国框架内不会成为问题的视角,在进入“东亚”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问题。编写“三国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可贵的探索,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在有关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上,三国的执笔者需要进行非常困难的协调才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论述,原因在于“国家利益”是一个很难简单跨越的制掣。问题在于,如果战争这一现代性最核心的事件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同时战争又分为加害国与受害国,战败国与战胜国,那么问题就不太容易简化为一视同仁的“批判和超越国民国家”。因为一视同仁的批判将混淆上述这些具体状况中的种种历史脉络,在客观上为加害国免罪;但是同时,如果不把批判和否定国民国家作为既定的视角,那么,是否意味着历史书写必须认同于受害国和战胜国一方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当受害国(战胜国)不止一个,相互之间又有着利益冲突的时候,在整体上使用二分法来处理战争历史,会遇到巨大的认识论困难:这导致人们避开那些纠缠不清的关键性分歧,而抽象地使用“赞成还是反对”这样的粗疏判断来回避问题。这些涉及国际政治学基本原理的问题原本就非常复杂,再加上日本政府在战后受到美国掌控,与台湾签订了单方面和约,从而使得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战后处理工作拖延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进行,这就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受害国的中国面对了太多的历史头绪,这也就使得中国大陆的社会舆论很难在认同国家框架之外找到处理战争的视角。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东亚视角的一个挑战。第二,在如何处理战争记忆的问题上,其实各国的有识之士基本上受制于本国的历史脉络和社会思潮,他们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态度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东亚化”,这也就意味着东亚不同区域的有识之士并没有进入可以一致行动并且建立相互深度理解的阶段。事实上,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东亚的进步人士之间并没有建立共识,特别是在当下冷战意识形态并未真正解体的情况下,曾经分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进步知识分子和运动人士还没有真正跨越冷战想象达成思想上的共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尽管日本的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对左派史学家考证死亡者